



沈永宏 苏静 编著

隆礼至法

——荀子谋略纵横



隆礼至法

——荀子谋略纵横

○沈永宏 苏 静 编著

○蓝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隆礼至法——荀子谋略纵横/沈永宏,苏静编著. —北京:蓝天出版社,1997.5

ISBN 7-80081-711-3

I. 隆…

I. ①沈… ②苏…

II. 荀况-谋略-研究

N. C934

604-30/15

蓝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路14号)

(邮政编码:100843)

电话:66784244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88千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9.00元

编 委 会

总策划：唐彦生

主 编：山 溪 周正舒 许志强

副主编：陈学建 暴淑艳 宋之谦

编 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许志强 孙家俊 朱少华

过亦林 吴 穹 汪 彦

陈学建 苏 虹 苏 静

杨一民 沈永宏 张国浩

周正舒 唐志龙 唐彦生

暴淑艳

前 言

“二千年之政，皆秦政也，二千年之学皆荀学也。”在二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荀子及其思想著作占据了显著而又醒目的一页，给后世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荀子名况，又叫孙卿，战国后期赵国人。他在15岁时到齐国游学，在稷下学宫居留较长时间。其后访问过秦国，又回到赵国，最后在楚国兰陵度过晚年。他培养的著名弟子韩非和李斯的思想，左右着秦始皇及秦朝的政治。他撰写的著作《荀子》一书，有300余篇，经刘向校阅整理，去其重复，编定为32篇，名为《孙卿新书》。到唐代中叶，杨京把《孙卿新书》32篇分为20卷，对名篇次序也重新编排，定名为《荀子》，今本《荀子》，即为杨京所编定。

有人说荀子是儒家，有人说是法家，有人说是刑名家，还有人说是墨家，这些说法都不对，也都对。荀子不拘泥守旧，不固执己见，而是博采众说，兼收并蓄，集百家之大成。他上承孔孟，旁收诸子，开启汉儒，是中国思想史上从先秦到汉代的一个关键人物。汉代思想家、政治家常以“荀卿有言”为断，可见其影响和威望。

荀子思想博大精深，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荀子批判诸子，继承诸子，扬其长，弃其短，并根据时代的要求，重新加以综合而成为新的思想体系。他关于强胜在于“隆信”的政治思想，富为人间正道的经济思想，以德兼人的战略思想，隆礼与重法并用

的法治思想，制天命而用之的自然科学观等等，无不显示其认识的深刻性，实践的可行性。因此，发挥其内在价值，弘扬其思想精华，具有重要的意义。

鉴于此，作者在本书撷取了《荀子》中的智慧精华，加以粗略的诠释，并多角度、跨时空地选择诸多相应范例加以佐证。读之、思之，将给你以启迪。

中国文化之丰厚，积淀在地那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历史当中。当今世界，无论是政界领袖，平民百姓，企业巨子，还是文化学者，无不从中吸取丰富的精神养料。当你在大踏步前进之中，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之中，别忘了驻足片刻，留意先人的训导，因为，他能给你以智慧，导你以捷径。

目 录

治 国 篇

1. 以德兼人 (2)
2. 义立而王, 信立而霸 (6)
3. 隆礼至法 (12)
4. 刑德兼用, 恩威并举 (17)
5. 赏行罚威 (20)
6. 刑称罪则治 (24)
7. 令行禁止 (28)
8. 隆一而治 (31)
9. 抓纲举要 (36)
10. 强本节用 (40)
11. 庶人安政则君子安位 (45)
12. 利而不利方称利, 爱而不用谓之功 (49)
13. 不可垂事养誉、遂功忘民 (54)
14. 王夺之人 (58)
15. 明主急得其人 (61)
16. 尚贤使能 (67)
17. “询于刳莛” (74)
18. 参之以礼, 禁之以等 (80)
19. 攻战之本, 在乎壹民 (84)

谋 事 篇

- 20. 天行有常，应之以治 (90)
- 21. 当时则动，物至而应 (95)
- 22. 不求其知形，但求其所以成 (98)
- 23. 敬其在己 (102)
- 24. 制天命而用之 (106)
- 25. 疑则不决 (110)
- 26. 善择者制人 (114)
- 27. 扬长避短 (119)
- 28. 积微速成 (122)
- 29.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127)
- 30. 事必先虑，慎终如始 (132)
- 31. 掩抑锋芒，忍智藏锋 (136)
- 32. 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 (141)
- 33. 善待君子，善处小人 (145)
- 34. 善假于物 (151)
- 35. 公生明，偏生闇 (156)
- 36. 虚壹而静 (160)
- 37. 沉默如雷 (165)
- 38. 贵其所贵 (169)

修 身 篇

- 39. “温温恭人，惟德之基” (175)
- 40. 澹然至极 (179)
- 41. 穷而不失，倦而不苟 (183)
- 42. 穷则必有名，达则必有功 (188)
- 43. 以义变应，与时屈伸 (193)

44. 进则近尽，退则节求	(197)
45. 高上尊贵不以骄人	(201)
46. 反躬自省	(204)
47. 择良友而友之，择贤师而事之	(208)
48. 学问不厌，好士不倦	(211)
49. 与人善言，暖于布帛	(216)
50. 防微杜渐	(220)
51. 钝金砉厉而利	(223)
52. 行胜于知	(227)

治 国 篇

和其余先秦诸子一样，荀子有着极深邃的治国思想。

荀子认为，要使国家强盛，必须行“胜人之道”，即“求仁厚明通之君子”“与之参国政”，慎礼义、务忠信，“隆礼尊贤”，“重法爱民”，“尚贤使能，赏有功，罚有罪”，等等。一言以蔽之，就是“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威行”。

1. 以德兼人

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

《荀子·议兵》

荀子生活在动乱年代。作为一名思想家，他在考察了各国的兴衰存亡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用道德兼并别国的可以称王天下，用武力兼并别国的自己会越来越衰弱，用财富兼并别国的自己会越来越贫穷。从古到今都是这样。

春秋战国末期，各国间纵横捭阖，都想“一统天下”，其手段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法家主张奖励耕战，富国强兵，以暴力兼并天下；墨家则认为兼并战争带来灾难，提出“非攻”的思想；纵横家也认为“战之为残”，主张“以智（谋）服人”；儒家则主张“发政施仁”的“王道”政策。荀子将上述方法归纳为三类，即“以德兼人”、“以力兼人”、“以富兼人”，自己则竭力推行“以德兼人”的战略思想。

“以德兼人”是“王道”与“霸道”的兼容，以武力为后盾，用自己的名声、德行赢得别国人民的仰慕与赞美，“兵不血刃，远迹为服”，因此“得地而权弥重，兼人而兵愈强”。而“以力兼人”，以武力吞并别国，由于人力、物力的大量耗损，必然是“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兵愈弱”；“以富兼人”，则由于财物的大量投入，必然是“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国愈贫”。荀子的结论是“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

荀子的“以德兼人”是儒家王道的集中体现，他接受了孟子“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观点，认为只有“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这与

黄老冷冷冰冰的算术算计和法家权谋的严酷冷峻相比，是富有人情味的。服心以服人，以收心服人而治国王天下，是儒家王道智慧的核心。儒家认为，臣民的心悦诚服是决定一切的根本，它是各种正当的治国手段的直接目标，是决定“治”与“不治”的核心要素。孟子云：“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在此基础上，荀子由表及里，以睿智的眼光，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在《王霸》篇中说：“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荀子还多次把老百姓与君王的关系比作水与舟的关系，在《哀公》篇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也是荀子着力倡导“以德兼人”的根本原因。

《策根谭》曰：“德为事业之基”。一个想成就事业的人，若心中不存仁德则无法发展事业。只有以德感化人民，以德征服对手，才能“得地而权弥重，兼人而兵愈强。”

吴起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军事家。他所著的《吴子兵法》和《孙子兵法》并称于世，被合称为《孙吴兵法》。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吴起深知德性对于一个成就大业之人的重要性。

吴起曾仕于魏武侯。某日，他和武侯共乘一舟沿着西河而下。途中，武侯眺望岸边的景色，回头对吴起说：“你看，多么壮观的自然景色。眼前这道天险，千军难破，真是魏国之宝也。”

陪武侯出游的大臣王钟谄媚地接着说：“这就是晋国当时强大的原因。如果再很好地修整一下，那么，我们的霸业就成功了。”

吴起听后反驳说：“非也！君主的话，是让国家走向危险之途，可你（指王钟）还附和君主，真是太危险了！”

武侯听了吴起的话，很气愤地说：“你这话真是岂有此理，你能讲出道理来吗？”

吴起答道：“国之宝物，并非山河之险。为政者能行仁德才是国家之宝藏。例如：从前三苗氏所管辖的国家，左临洞庭湖，右濒彭蠡湖，自恃山河的险要，而不知讲修德义，结果，国家给大禹灭掉了。

“夏桀的国家，左有黄河和济水的天险，右有泰山和华山的屏障，在它的南边和北面，更有那伊阙之固和羊肠之险。可是夏桀自恃有这么险峻的山川形势，只知暴虐百姓而不讲修仁政。结果，王朝给推翻了，而他自己也被商汤放逐了。

“还有殷纣王也是一样，他的领土，左有孟门的险，右有太行的牢固，巍峨的常山在它的北面，浩浩的黄河流过它的南面，四面依山傍水，国土可谓险要无比，可是他不修德，专事酷虐百姓，终为周武王所诛。可见国之宝，并非取决于地形，乃在于为政者的仁德。如果君王不行仁德，那么今日所见的两岸风光不久就要成为敌人的景致了。”

依现代的眼光来看，这正像一位拥有最新式自动化工厂的经营管理者很自豪地对下属说：“你看到的这些新型机器，真是公司之宝啊！”然而贤能的下属却会对他说道：

“不对！一个公司最重要的不是设备，而是经营者本身的修养和素质。”

为什么“仁德”对领导者、经营者竟如此重要呢？

因为“仁德”表现着一个人的品性，有仁德的领导者具有一种“无言的说服力”，他不须以严令申诫，便可收到莫大的功效，他会深受部下的信赖和爱慕，常常能事半功倍。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在临终之际，曾留给儿子刘禅一封遗书，里面写道：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可以服人。”

刘备一生，正因以德服人，才能卓立于乱世之中。有人说：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且不论此话是否正确，但刘备智不如诸葛亮，勇不敌关羽、张飞却是事实。而他的德足以弥补其不足，因此，他叮咛刘禅要惟贤兴德，这正是刘备一生经验的精辟总结。

就刘备的能力而言，他远不及魏武帝曹操。但刘备却能收揽像关羽、张飞、赵云以及孔明等文武奇才。刘备年轻时，历经磨难，时

常陷于艰难困苦的境地之中而不能自拔。在当时群雄割据、战乱纷争的情况下，他曾先后投靠过吕布、曹操、袁绍、刘表等人，直到遇到诸葛亮孔明之前，几乎在事业一无所成。

在避难荆州时，徐庶走马荐诸葛，于是刘备三顾茅庐，礼贤下士，诸葛亮在其著名的《出师表》中曾提到此事：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刘备三顾茅庐时，已 47 岁了，而诸葛亮却只有 27 岁。当时的诸葛亮虽在南阳乡里很有名气，但在世人眼里，也不过是个有学识、有才气的穷书生而已。诸葛亮“拒见”刘备，也是想以此来试探刘备是否真有诚意请他出山，是否真的思贤若渴，是否真能礼贤下士而已，而刘备确实是位具有仁德之心的长者，经受住了孔明对他的考验。从此，孔明出山，为他奠定了蜀国的基业。

一位贤明的领导者，如果具备仁德，即可深得民心，得民心者就能成就大业，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2. 义立而王，信立而霸

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赌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赌利败，不欺其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策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

《荀子·王霸》

荀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虽然品德还没有达到完善的程度，礼义还没有完全做到，但是天下的事理大体上掌握了，刑罚、奖赏、禁止、许诺等等，在天下已取得了信用，臣民们都清楚地知道可以相信君主。政令已经颁布，虽然看到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仍然不失信于人民；盟约已经签定，虽然看到既有利也有害，仍不失信于盟国。如果这样，就能兵力强劲，城池坚固，敌国畏惧；国家上下一致，不失信用，盟国信赖。虽然国家所处的地方偏僻狭小，但是它的威名却震动上下，五霸就是这样的国家。

信，从人从言，反映“信”体现于人的言谈之中。“信，诚也”，“诚，信也”（《说文解字》），“信”“诚”相通，说明“信”就是言语诚实可靠。荀子对信作过解释，他说：“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非十二子》）认为相信可以相信的是信，怀疑可以怀疑的也是信，并提出“上下相信”的主张。这就揭示了信的实质。它的谋略意义主要

是指人要“诚实不欺”，其中包括笃守信用和取信于民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信，是先秦思想家们所重视的谋略思想。孔子把“信”推为立政之本，认为“民信之”比“足兵”、“足食”更为重要，“民无信不立”（《论语·颜回》）。孟子认为“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孟子·尽心下》）。还说：“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荀子在先秦思想家们的基础上进一步作了总结，把“诚”“神”列为“谈话之术”。他说：“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欣欣、芬芬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非相》）这就讲明了谈说之术归根到底是为了使人“神之”，即信服。

荀子认为“信”是无条件的。荀子说：“耻不信，不耻不见信。”又说：“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非十二子》）主张每个人都要有从自己做起的精神，即耻于不讲信任，不耻于不被信任。一个人可以做到被人信任，但不能使人一定信任自己。有了这样严于律己的精神，就会做到：在被人信任时能讲信，不被人信任时也能讲信。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家踏上“忠信”的途径。荀子把“信”看成社会每一个成员所必须履行的义务。他认为“百工莫不忠信而不苦”，也就是说“信”是百工的职业道德，具体说来：

为商者讲信，生意才能兴隆：“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王霸》）

为工者讲信，产品才会精巧：“百工忠信而不苦，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王霸》）

为农者讲信，生产才能发展：“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王霸》）

为师者讲信，教育才有威望：“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臣道》）

信，固然人人要遵循，但为官者率先讲信，这是至关重要的。荀子反复强调这一点。他说：“上端诚则下愿悫矣”，“上幽险则下渐诈

矣”(《正论》)。认为只有“上信”，才能使“下信”。不然“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离散)也”(《王霸》)。荀子举例说，古时候，禹、汤以义为本，以信为重，从而使天下达到大治；桀、纣背信弃义，从而导致天下大乱。为此，荀子强调说：“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强国》)认为守信是做君主的最大根本。

荀子认为人人要守信，大至治国，小至交友、言谈，时时处处都要守信。荀子提出了“庸言必信”的主张，他说：“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甚，若是则可谓虑士矣。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不苟》)这里指出：即使是平常的言论也必须做到诚实可信。在顺利的环境，或在困穷的环境时都得讲礼信。荀子说：“宜于时通，利以处穷，礼信是也。”(《修身》)也就是说，即使长期处在贫困之中，也不要忘记平日的诺言。

荀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本来是“仁”，认为“仁”是“至德”。为什么又反复强调“务忠信”呢？“信”或“仁”的关系怎样呢？荀子说：“若夫忠信端悫而不伤害，则无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质也。”(《臣道》)认为忠诚守信，正直而不伤害别人，无论与什么人交往都是这样去做的，这是仁人的本质。在荀子看来，“仁”是道德思想的一个总的概念，而“忠信”仅是“仁”中的一个方面。荀子认为“仁”是“士”、“君子”的最高要求，而“信”是为人的起码条件。在《臣道》篇论述忠信和端悫、礼义的关系时，荀子作了明确论述：“忠信以为质，端悫以为统，礼义以为文，伦类以为理，端而言，蠕而动，而一可以为法则。”这里“忠信以为质”以及“忠信”为“仁人之质”，讲的都是一个意思，即谓忠信是普通人做人的起码条件，也就是说，要达到“仁人”的崇高境界，必须从“忠信”做起。

诸葛亮火烧新野后，曹操勃然大怒，令大军兵分八路攻打樊城。孔明见形势十分危急，建议刘备弃樊城，取襄阳暂为驻足。刘